

【学术对话】

从“新清史”到满学范式¹

项飙、刘小萌、欧立德²

项飙：今天的主题，像在我们告示里说的，是关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尤其是现在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相当复杂的问题。正是因为它如此复杂，我们觉得要泛泛地去谈可能很困难，可能也达不成有效的交流。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从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也相当重要的一个民族来对民族问题进行反思。这就是满族研究。大家也知道，满族研究从原来在学术界或者在公共意识里相当边缘的一个案例，到2000年以后，成为一个在历史学、民族研究甚至政治学里面讨论最多的一个子学科。所以我觉得满族研究不能够仅仅被看作是对单个民族的个案研究，而是应该把它看作一种范式，看它怎么样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很复杂，可能没有答案，也很难达到结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讨论如何提出好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去探索有效的假设。

坐在我左边的刘小萌教授，是汉语世界关于满族研究的代表，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去年荣休之后，在继续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一个全方位的、从本科到博士、推进满文教育、满族史教学的工作，为下一步的满族研究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坐在我右边的欧立德教授（Mark Elliott），是英语世界里面关于满族研究、也是关于许多人说的所谓新清史的代表。这里我插一句，我前面讲到满族研究可以作为一个 paradigm，我现在所说的新清史可能是这个 paradigm 里面的一个部分。这个 paradigm 背后可能还有很多更复杂更有效的交流在后头，不能被所谓的新清史所代表。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想展现的东西。现在不管同意不同意，大家把欧老师当作英语世界里面新清史的代表。他是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两个系的讲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的副教务长。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是不是现在哈佛大学在处理各种多样文化时也采取了一些 Manchu ways？

我自己是完全不懂这个专业的，但是我很想强调，今天我们在台上的这个一个半小时的对话，必须要至少上溯到1990年。就是说今天这个对话是他们从1990年开始的，是二十多年以来不断对话的一个延续和一个片段。这个历史背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想先把这个时间回放到1990年或者更早，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两位讲一讲满族研究是什么？你们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边缘的话题，然后你们在中间又看到了什么。是不是请刘老师先讲？

一、满学研究的意义与范式

刘小萌：按大陆的原则是先左后右，因为“左”比“右”好。所以那我就先讲。

首先我要感谢香港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跟欧立德教授已经认识几十年了，在不同国度从事着同样的研究，一直想找一个对话机会，前几年曾经一度有过希望，说哈佛大学的一些年轻老师还是研究生准备筹备一次对话，围绕着新清史，可是后来大概是因为经费没落实，就落空了。没想到，今年初香港大学征求我意见在这儿举行对话。首先我感到很振奋，当即就答应了，

¹ 本文刊载于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第157期，2016年10月号，第4-26页。

² 作者介绍：项飙，牛津大学人类学院教授。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吉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聘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历史系讲座教授，暨国际事务副教务长。



我说那你就看欧立德教授有没有时间，因为我知道他比我忙。第二个呢，我也有些担心，因为这个话题在北方是一个热点话题，尤其在东北、北京等地，是研究清史、满学的传统地域。可是在南方，这个话题，会有多少人关心？前些年我在台湾开一次清史会，一位有名的学者——我当然不能提他的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会议休息期间，他走到我面前，质问道：“有满族吗？还有什么满族？满族早汉化了！”我一下子就愣了，心想：你一个大学者，怎么对北方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无知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没法跟他对话。这次来港大发现，咱们还有这么多的教授、知名学者、也包括年轻的同学们，关注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也是我首先要向学校、向在座各位嘉宾表示感谢的。

刚才项教授说这次对话是围绕民族问题展开，那我和欧立德老师毕竟是从事清史、满族史，或者说大一点儿是从事满学研究的，我想，这应该是这次对话的切入点。在给定的几分钟里，首先想表述一下我所理解的满学是什么。简单地说，**满学就是满族学，简称满学，就是指以满族为中心、以满族为研究对象的一切学问**，如历史、文学、语言、宗教、艺术甚至书画等，都包括在内。在满学研究中，无疑最重要的是历史，而历史研究又离不开满文，所以在这方面我和欧立德教授是有共同点的，因为我们研究清史，都注重从满族角度来研究，并且都注重利用满文文献。

满学研究的意义何在？我概括为三点。第一，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满族是很特殊的一个民族。2000年人口普查，它的人口超过一千万，在各民族中位列第三，仅次于汉族、壮族。可是在十七世纪初满族入关以前，其人口究竟有多少，学界一直弄不清楚。前辈学者做过考证，后来却发现估算的人口太多，最终还是通过满文档案解决了这个难题。顺治五年的一件满文题本，有精确数字。当时满人入关未久，全部壮丁，当然不包括妇女儿童，大概十六七岁到六十岁吧，有五万五千人。八旗满洲壮丁当时是五万五千人；八旗蒙古壮丁是两万八千人；其他二十多万是汉军旗人和汉人奴仆。所以清朝入关时，八旗就是一支以满洲人为核心、可是在人数上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军队。就是这五万五千满洲人，某种意义上征服了中国。当时中国汉人有多少？一般估计是一亿人口上下。这么悬殊的人口比例，为什么能成功？欧立德老师说过，这是一个历史之谜。所以我想，作为满族史起点的，就是要研究满族人以如此少的人口，却能够建立这么一个庞大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满族人的遗产。大家都知道，在近一千年中，中国历史的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王朝在统治。从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到清满洲。在北方民族所建王朝中，清朝又是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将近三百年。它的成功之处在哪？又是一个历史之谜。至于满族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我觉得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治遗产。现在，中国学者与美国新清史分歧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形成过程中，满族人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评价这种作用。我想，作为政治的遗产，包括庞大的疆域，也包括众多民族及其多元文化，都是随着满族人的清朝来实现的。

再者，我所理解的这个政治遗产，不单是历史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还延续到现在。满族人统治中国，基本制度为两元结构，即用汉制也就是州县制治理汉人，同时用少数民族制度治理少数民族，后者又包括：用八旗制度治理满人，用理藩院管理蒙、藏、回等众多民族。中国发展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延续着这种两元结构。这话怎么讲？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至少名义上属国家民委兼管吧，每个少数民族在国家民委都有代表，国家民委的官员大概是比较多的，因为主要民族都要有一个副主任。与这个体制相呼应，一直到省、市、地、县，都有相应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满族没有自治州，可是有自治县、自治乡、自治镇。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两元结构的遗存犹在。

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能感受到这种政治遗产的影响。今年5月16号是“文革”爆发

五十周年。“文革”十年浩劫，当政者大搞阶级斗争，整人的话，首先就是讲家庭出身，查你的家庭出身。你们家是地主呢，还是富农？是资本家呢，还是“历史反革命”？当时叫“查三代”，就是查你本人的成份、你父亲的成份，还有你爷爷的成份。后来我研究满族史才发现，这个“查三代”是从雍正皇帝那一脉相承下来的。雍正皇帝整顿八旗制度，为防止汉人混入，建立查三代制度，凡是参加科举、当兵、做官，都要查三代。这种做法不仅延续到清末，而且如众所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后一度发挥到极致。这种现象之间是否有直接关系，我不敢断言，但贯穿其间的、依人的血统高低决定对其弃取的宗旨，是显而易见的。清朝政治遗产的影响有利有弊，当然远不止这些。

我跟国外学者交往，包括日本的学者、美国的学者、法国的学者、韩国的学者，尤其是日本的细谷良夫教授长期从事满族历史与现状调查，我由衷佩服他对工作的投入和痴迷。我曾问他：“为什么你对我们的历史那么感兴趣，比我还投入？”他的回答出奇的简单，就是为了了解中国。我们要了解现实的中国，不能不了解距离我们很近的清代。从清代到民国，再到现代，许多现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制度建设、内外政策等，都有联系。这就是政治遗产。

其次是文化遗产。关于这点我就不展开了，因为正是由于清代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囊括了五十多个民族，五十多个民族是现在的官方说法。正是由于清帝国，以这些民族为载体的多元文化才全部纳入到中国版图。

最后是史学遗产。历代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满族除外，留下的本族文献都较少。尤其作为游牧民族、马上民族的契丹人、蒙古人，留下的史料更少，加上历代兵荒马乱，半个多世纪以来变本加厉的政治运动，尤其“文革”浩劫，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相比之下，满族人的史学遗产虽也遭受到严重损毁，但存世者仍非常丰富，仅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文档案就有二百万件以上。在北方各省、台湾，以及日、美、俄等国，都保存有数量可观的满文档案、文献、文物。另外，还包括清朝用汉文编撰的大量与满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典籍。如此丰富的遗产，我们对它的研究，其意义绝不限于满族本身，而是涉及到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所以我想说，研究满学，包括利用满文从事研究，实际是了解中国民族与民族关系——首先是北方民族关系——的一把钥匙。因为在清代满汉关系问题上，我们从中得到的诸多启示，有助于理解历史上的多民族关系。因为大家也知道，“民族”是近代传入中国的一个外来词。而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由来已久，但是可资利用的历史文献却明显不够。满族留下的丰富历史遗产，给我们提供了连结历史与现实的一条纽带、诠释中国多民族与民族关系的一把钥匙。这是我想说的一点。

至于研究现状，不想多说了，因为一会儿的对话可能要涉及，而且欧立德教授的国际视野比我开阔，所以这个任务交给他。至于治学，有时间再谈吧。

项飙：行，请欧老师发言。

欧立德：我也跟刘老师一样谢谢各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这来跟我们一起坐一会儿，谈一谈满学和民族学之间的关系，然后满学和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此一些问题。我也很高兴可以回到香港大学来。大概四年前，梁其姿教授请我来演讲。每次有机会回来，我都很乐得答应，尤其是这次受金由美教授邀请，她以前上过我的课，我不太不好意思说不行。然后她说刘小萌也要来。我跟小萌认识——他是我的师兄，都是跟王锺翰先生在一起，那是1990年，那时候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不在中央民族学院（那时候不是中央民族大学，还是民族学院），但是我在那之前就已认识王教授。之前我在东京读书，然后在中央文库，有一次王教授过来，我就有机会认识他，他说我到北京一定要找他。之后他说特别安排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座谈会，让我介绍一下我想做的研究。那时是关于八旗驻防的研究。就那时候认识了刘小萌、定宜庄、屈六生，还有一些研究满学的朋友。

像项教授刚才说的，今天的这个对话其实延续了二十五年。我们常常有机会见面，但是从来

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交流。所以非常难得，谢谢。

刚才刘教授提到，没想到在香港，在南方，居然有人对满族有兴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这个解释我后来要做说明。今天的这个对话不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对话的延续，因为满学一直是非常国际化的专业。对于满文和对于满洲人的历史感兴趣的是从中国开始，但从十七世纪，已经有西方来的传教士开始研究满文和历史、文化、宗教等。大概是两百年左右，在巴黎就开始有一个我们比较能认同的满学的学术的诞生。那时候就有年轻的学者 Abel Remusat 在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成立了最早的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语言的讲座教授，其实那个人一面是讲中文的文学和语言，另一面是讲满文和满洲人的文学。那是 1814 年，距今刚两百年。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满学在欧洲、俄国、日本都非常盛行。二十世纪主要是在德国，然后在日本。二次大战之后就流到韩国，欧洲都只有在德国。然后是很晚，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才开始对满学感兴趣，才开始有人在美国教满文，最早大概是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所以这个专业一直很国际化，我跟刘小萌在日本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我们看日本同行这方面的文章和书也比较多，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当深刻。这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也有关系。

奇怪的是，大概二十年前吧，在美国做满学研究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机会了。欧洲也不乐活了。在德国教满学的三大教授，分别在柏林、波恩和科隆，他们退休之后没人接班；威尼斯有人教满文，但那个人退休之后便没人接班，而德国也没有人教满文，美国就只有哈佛大学有人教满文。这跟我 1980 年代当研究生时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这么说，当时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但是二十世纪末就变得有一种危机。没想到不到二十年，情况就很戏剧性地变得不一样。目前不止在哈佛大学，而且在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地方，都有人教满文了。

关于满学的态度有明确的转变，或许我们也可以讨论，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民族学也不是没有关系。所谓“满学热”，我们可以追到什么时候呢？也许不是《还珠格格》就是《步步惊心》，不是《步步惊心》就是《甄嬛传》，大家都愿意看这些“辫子戏”，看那些打扮成满洲人的样子，以致那些清朝朝廷里面的电视剧这么受欢迎。我想这个反映了 80 年代以后大家对于民族和民族认同这些问题愈加感兴趣的趋向有关。

刚才项教授请我们说一下怎么会对这些问题、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就我来说，也是出于偶然，因为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有机会到沈阳留学一年。那时候，在大学上过中国历史的课，知道有清这么一个朝代，但是也没有什么研究，学了一点中文也还是很初级。在沈阳住了一年之后，就发现其实满洲人很有意思，人数这么少，统治中国这么长时间，这要怎么解释呢？然后，有人说满洲人汉化了，但与此同时，清末又有“排满”的情绪，如果满洲人都汉化了，怎么又会排满呢？如果真正汉化了，谁能认清楚谁是满洲人呢？应该是还存在一个什么东西，把满洲人和周围的汉人判然分开的。那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想久了，加上学了一点满文，看了一些史料之后，我就开始想，如果把满洲人当作值得研究的历史主体的话，那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想那么做的话，应该怎么做？从那个角度来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什么？对于中国近代史——我说的近代史其实是“early modern”，前近代，就是从明末清初一直到现在——会有什么新的启发？当然是希望有新的启发，但不见得，当初开始学的时候，也没有保证，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不止要学中文，还要学满文，这个到最后还会有什么结果。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冒险。

那时候我是在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读书，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教授是我的导师。有一次李中清老师从南加州到 Berkeley 来，他问我：“你想研究什么题目？”我说：“我大概是要研究八旗制度了。”他说：“很好，应该要有人研究。”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在走廊里的那个对话，很受鼓励。他可能忘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就觉得做这个专业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因为是清朝，封建社会、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谁也不管。没想到以后的新清史会变成这么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微博、豆瓣上，甚至在社会科学院的网站上，有人那么激烈地谈。当然有人骂新

清史，说它不科学，不准确，甚至骂我，说我是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也看得不是很高兴，但总觉得这个毕竟比谁也不理你要好，至少有人在看我和我的同行们在写什么东西，这多少促进同行们更加注意与我研究相同问题的国内同事的研究，用新的眼光去看像刘小萌、王锺翰、定宜庄等专家写的书和文章。因为我们的研究以前属于政治史的边缘，现在可以说已经不是边缘了。

这就回到原初提到为什么在香港要举行这么一个对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香港也是边缘。边缘很重要，要知道最中心的那个地方在发生什么，人们在想什么，你先看边缘，你就可以知道，因为在中心谁都知道的那些事实，但是在边缘却不是那么明显，人家还要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做、这样想。在北京根本不需要这样，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而在边缘就不是这么一回事。要讲满洲人都是边缘，满洲人统治中国，满洲人的身份是什么，其实我们开始探讨这些边缘问题就会发现，它会有助于了解一些很重要的议题。

作为范式来说，我想讲三点。第一是语言，如果不研究、不学好语言，你的学问不会做得好。你问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们都会跟你这么说，我就是这么一个教条主义者。

第二，满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要从“他者”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去想历史问题，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然后，再从边缘看中心，这个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老师也写过一本书，《从周边看中国》，讲的也是类似的道理。苏轼有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项飙：好，谢谢。一会儿我很想听到大家的问题，使对话进一步继续。但是在这里我先问一个问题，欧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跨越长时段的、全球的满学研究传统的回顾，从巴黎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全球化的兴趣。在宏观上，我们可以建构这样的学术研究史，但是我想这个历史的内部是有很多断裂的。比方说具体的研究者，他不一定总知道以前有巴黎的这么一段，或者说不知道俄罗斯对这方面的兴趣；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他的出发点不是作为这么一个学术传统里面的学者去研究这些问题，他首先是觉得自己是作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来研究问题。我想刘老师讲到遗产问题也是代表这样的取向。所以我就先想请刘老师响应一下。像以欧老师代表的这样一个，姑且称为“西方学者”，他这种学术传统的意识很强，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学术上的好奇，比方说为什么少数人能统治这么多人，为什么说满洲人汉化了但又出现排满，这些都是一种好奇；而且有很强烈的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但是我们自己可能有另外一个传统。我想知道，你觉得跟西方同行交流之后，你看到了什么以前没有看到的東西？或者说，从你现在从庐山里面看，你觉得庐山外面那些人是不是又有他的盲点？

二、“求同存异”与“从边缘看中心”

刘小萌：这个题目够大的。所以我还是从一句中国传统的话来讲，原则就是四个字，“求同存异”。我们先谈“同”，然后再谈“异”。我们过去为什么某种程度上说满族史研究或者说满学研究比较边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清朝灭亡以后，中华民国的史学叙事基本是对满族统治完全否定，代表作就是萧一山的三大本煌煌巨著《清朝全史》，他把清代纳入近代史，讲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就是民族革命。他把民族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清代就是反满，清代以后就是反帝，到抗战时期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贯穿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就是这个。在这种权威话语影响下，对满族历史的轻视和歪曲经历了很长时期，这就不细说了。刚才欧立德老师谈到满学研究在前些年的困境，后继无人。对此我深有同感，当时在大陆面临着同样的状况，八十年代初，除了我们几个跟着王先生的治学路子走下来，真正用满文做研究的人，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门从事满文翻译的人员外，把满文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的人凤毛麟角。后来有位日本学者，我们两位的好朋友和老师，今年已

经八十二岁的细谷良夫教授。前些年，他曾经多次问我：“我们跟谁去对话？你给我介绍介绍，中国的年轻一代，跟谁对话？”我掐着指头数数，确实不好说。真切感到后继无人的危机。

另外就说到欧立德老师，你们说的新清史代表人物，欧立德老师陆续培养了一些满文比较好的学生，到北京的档案馆学习，这样就加重了我们的危机感。美国在培养，日本也在培养，日本从事满学研究的人虽然比较少，可是熟练掌握满文的一批中青年，基本上已经形成梯队。

欧立德：包括东京大学现在……

刘小萌：东京大学的杉山青彦也是一个。日本形成了一个研究梯队。当然哈佛大学、美国，也形成了一个梯队。所以从我这儿讲，危机感非常强。

欧立德：该你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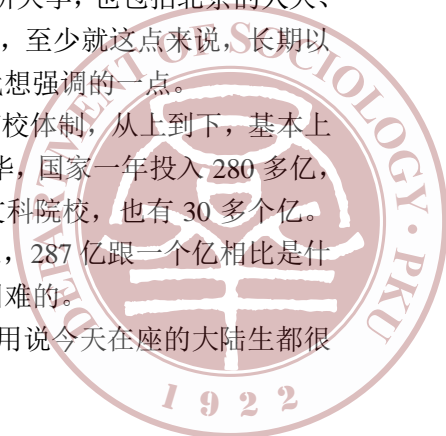
刘小萌：所以我们也开始做一点儿追赶工作。我去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了，这之前我已经受聘到吉林师范大学，它在大陆只是一所普通高校，因为在东北，研究满族历史文化也有传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一些教学理念，如果在北京高校，恐怕很难贯彻，因为你不过就是一个兼职教授，一个教书匠。在吉林师范大学就不同了，他们没有自己的资深教授，所以很尊重我的意见。三年来，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有益工作。到今年我已经招了八名博士生。我去之前，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没有非汉族学生，现在我招的博士生里，锡伯族有两个，还有蒙古族的、满族的，多民族大家庭。我特别感动的是，有的锡伯族孩子是辞掉很好工作，从新疆过来的。所以我感到，在中国，谈到民族认同也好，民族责任也好，这种情感确实是有的。他们为了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研究本民族历史，可以放弃优越的条件，到这么一个小学校来学习，确实感动了我。而我们在追赶的道路上还是很有成绩的。我到校后，先把日本的楠木贤道先生聘为常任教授；在大陆很有名的清史学家杜家骥教授，退休后来吉林师范大学教书；还引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吴忠良博士。当然了，我们的现状不要说距离哈佛大学太远，距离香港大学也太远，可是我觉得在发展满学研究上，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努力做一些培养工作，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也想借这个场合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诸位同学老师，凡是对满族历史文化、东北地方史感兴趣的，欢迎到吉林师范大学进行交流。

项飙：那我追问一下，除了培养之外，在国际视野下，你自己有什么战略性的目标，就是说以吉林师范大学为中心，把中国的满学做成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你自己的特色、特长，有没有战略性的定位？

刘小萌：首先我想补充两句，就是满学研究长期以来是比较边缘的，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我和定宜庄是同届，是王钟翰先生的开门弟子。正是由于新清史研究的兴起，所以现在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以这两个地方为重点地区，一批年轻人现在对满学产生兴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满学研究从一个原来很边缘的处境，现在成了一个视野的中心。五月在大陆是答辩月，大陆的硕博研究生非常多，相当多学生，有北大的、人大的、民大的，包括东北等地高校的学生，不少论文是围绕八旗、满族史来写，尽管他们的老师未必熟谙此道，论文水平也参差不齐，但至少说明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专题的重要性。包括学习满文，现在东北的几所大学，也包括北京的人大、民族大学，都有一些老师在从事专门教学。所以在满文人才的培养上，至少就这点来说，长期以来的危机已经大为缓解。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互动的结果。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至于推进国际化的具体构想，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中国的高校体制，从上到下，基本上是用行政手段办教育。国家的教育投资按高校等级分配。像北大、清华，国家一年投入 280 多亿，在教育部属 200 多个高校中，中央戏剧学院是经费最少的，因为是文科院校，也有 30 多个亿。可是像吉林师范大学这样的省属院校，实际上就是一个亿左右。你想，287 亿跟一个亿相比是什么概念？所以要想在科研上作出优异成绩并推进国际间交流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点，我们在生源上也有困难，大陆的优秀生都去了哪儿？不用说今天在座的大陆生都很



优秀，其中一些优秀的恐怕香港也留不下，他们会去美国深造、就业，或者去欧洲哪儿哪儿。像我们这类学校在生源上比较困难也就不难理解。所以我们的重点只能立足于自己培养，选拔比较优秀的本科生、硕士生有目的地进行培养。比如说蒙古族学生，有的满语、蒙语、日语好，只要给他一定培养，就有发展前途。刚才欧立德教授提到满学研究的欧洲传统，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一直学的是俄语，有清一代唯一长期在北京居住作为传教团同时兼有外交使命的就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留学生，用俄文写的有关北京城、满人历史文化、满语文，也包括教会活动、宗教信仰等内容的著述多达 200 余部。但正是由于缺乏兼通俄文和满文的人才，这方面研究长期无法展开。所以我们现在从招收硕士生起就注意选拔这类人才。除了懂英语的学生，我们现在更提倡日语，因为研究满族史首先要重视吸收日本的研究成果，在这点上我跟欧立德老师有共识。可是现在年轻的学生都愿意学英文，不愿意学日文。至于俄文，现在包括东北地区基本都不学了，所以寻找会满文又兼通俄文的学生就比较难。当然我们也在尝试，专门从俄语系选拔学生，然后培养他学满文，读历史，循序渐进，一步步深造。

欧立德：我打断一下，即使是年轻学生比较愿意学英文，也可以学日语，学两种外语不是不可能。

刘小萌：可以，这个不排斥。我的博士生，还有自学韩语的。高丽大学去年成立了满学研究中心，我对他说，你既然会韩语，满文又好，以后不妨到韩国访学。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的“偶像”在美国（指欧立德老师），以后要争取去美国留学。老师的意愿只是老师的，年轻人的追求是另一回事，他们有他们的自由。从我的角度讲，只有努力培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没有国际视野，连起码的国际视野都没有。单凭我，凭楠木贤道老师的努力，都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一再强调，以后学生要走出去，要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

项飙：接着这个国际化视野的议题，我想问一下欧教授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您过去二十多年和中国学者、大陆学者交往过程中，你觉得你看到了一些原来你没有看到的什么东西吗？他们的视角是不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第二个更宏观一点，如果以满学研究为例子，你能够给我们讲一下一种新的多视角、多中心的，但又高度国际化的历史研究吗？就是说，比方像刘老师讲的，韩国的满族研究可能有自己的特色，也是一个中心；美国可能是公认的一个中心，由于各种资源上的原因，等等；但中国也是一种中心。然后各个中心都会有自己的视角。我想满族研究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不同视角之间的争论，这不仅是史料的准确不准确，而且更是视角的问题。所以今后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高度全球化，但内部又非常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范式？

欧立德：谢谢。我想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大陆学者的视角。我觉得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专业，无论是所谓新清史还是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我们现在在迈入一个新的时代。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说在美国或在欧洲，因为欧洲汉学研究有历史传统，我想强调这个历史传统。因为历史传统我们每个地方都有，是三四百年以前在西方已经开始有人很重视中国历史，这个是整个人类的遗产。我们都有权利也都有责任去好好照顾那个传统。我是这么想的。那么以前在美国、在欧洲做中国研究的，很多年以后，中国的学者才开始稍微有点认识，或者是有点了解，或者是开始注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美国现代汉学创办人、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他的书大概过了三十年以后才开始翻译成中文。当然，像王老师这种少数看得懂英文的人，看过费正清的书，一定是跟费正清上过课，因为他在哈佛留学的时候是费正清当教授。但是就是很少。所以费正清和他学生，像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书，例如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才有中译本，可能在最近十年以内。所以这里总存在地方和时间上很大的隔离，把我们两个学术界分得很开。比方说我 1990 年或者是更早，八十年代初，在大陆留学那时候，我在辽宁大学有个很好的导师，但是我跟他沟通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致我们能够相互了解对

方在说什么。这需要很大的努力。我要说的是，这个新的时代，距离缩小了很多。譬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对话，我相信今天晚上、明天，微博上已经有人开始讨论，也会讨论我说他们会讨论的。这是一种后设叙述 *metanarrative*，会和新的出来。这个虽然不要说是空前的，但是我们以前没有过的一种经验。我觉得给我们每个人的刺激很大，我们负上的责任也很大。所以我看大陆学者的文章和著作的时候，我知道下次到中国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们。我们可以喝个咖啡，吃个饭；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在同一个虚拟真实 (*virtual reality*)，同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可以进行这么一个对话。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新格局，新情况。

说到第二点，从老外的角度去看中国历史，想要了解一下中国历史。因为我开始学中文、学中国历史的目的，其实跟我们的老师细谷先生一样，就是想多了解中国。从老外的角度，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研究，给我什么启发；从“他者”的角度，什么新的视角。举个例子说明，我以前用英文的词 *empire*，用现代汉语说就是帝国，我心中的 *empire of China*，中华帝国或者是大清帝国，我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说“帝国”。想久了呢我就觉得，其实我看的清代文献里面从来没有人讲什么帝国。为什么用“帝国”呢？帝国是什么？我们说“中华帝国”、“大清帝国”的时候，我们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对于帝国，给的是什么定义？我说“帝国”跟刘小萌教授说“帝国”——如果他愿意说“帝国”，他可能比较愿意说“帝制”而不是“帝国”，因为“帝国”这个词的含义很复杂。这就给了我一些新想法，对于清朝的整个体制跟以前明朝、元朝或者宋朝，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这是很肤浅的一个例子，但是我最近在搞这个，所以就提这个。

三、“汉化”问题与“中华民族”概念

项飙：好，谢谢。那我想现在不仅应该把 *virtual space* 而且是 *physical space* 打开，邀请大家提问。最好的提问当然是说能够促进他们两位继续对话的问题，请大家踊跃提问，因为你们一提问，马上都会上微博，你们的声音，立刻会在大江南北得到响应或者是攻击。好，梁其姿老师第一个自告奋勇。或者我们可能采集两三个问题，然后一起回答。

梁其姿教授：项老师，你刚才开始的时候说你的角色就是让他们两个不打架，其实我想的恰恰相反，你的角色应该是让他们打架。所以如果他们不打架，听众大概就觉得有点不满足。当然我是在开玩笑。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对话有打架的期望呢，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满语研究在清史研究里面作为研究工具，它的重要性怎么样，那是很心平气和讲历史研究方法，大家这个架打不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清代历史在中国现在国族讨论里面的角色是什么，这个可能就会让大家有些情绪了。我就讲我最记得的经验。我三月的时候在中国大陆，跟很重要的一个出版社的一个编辑聊天，他说最近在国内出版社都查得比较紧，很多字就要删掉，不能用这些词，因为上头会不喜欢。他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就不准说“满清”，“清”就是“清”，不能说“满清”，意思就是说清代就是中国一个朝代，那就跟宋代、明代一样，就要说“清代”，不让说“满清”。那今天一开始刘老师就说他去开会，那个很有名的清史专家说满人都汉化了，没有什么满人，这个没有什么什么。其实这个也牵涉到汉化的问题。今天两位都欲语还休的，就没有讲明白对于汉化，到底您们的立场是什么。当然有关满人汉化的问题，我们非常尊重的何炳棣先生，他跟罗友枝 (*Evelyn Rawski*) 对谈，就是他是反对罗友枝，认为满族人有的“*agency*”在里面。他是真的认为满族人就汉化了。当然何老师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历史学者，他没有用满文来做研究。那我想问两位，你们用满语作为研究清代的工具，对你们研究有关汉化的历史过程会有什么影响？你们两位对汉化的看法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会不会打起架来？

徐国琦：这个打架问题，刘老师刚才说要求同存异，欧立德老师是西方学者，你是大陆学者，

你们“同”在什么地方，“异”在什么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接着打架，你提到中华民族和满族，欧立德也提到，因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存在，那么满族人他们当时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满清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有不同的界定？

项飙：那我们先就这两个问题打一下。刘教授先出手，还是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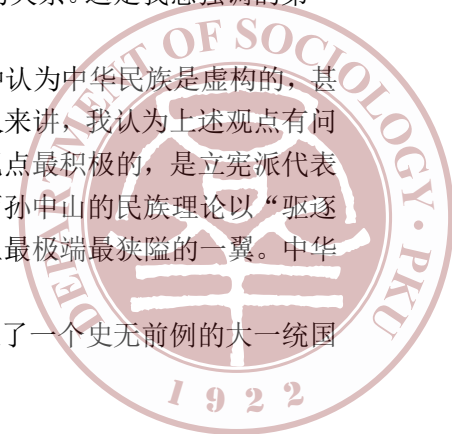
刘小萌：那无所谓了，我当靶子也无所谓。刚才我也说了，求同存异。刚才说的是“同”，现在就转入正题了，该说“异”。因为我来之前，就有老师跟我说，从网上看的，说这叫“世纪之辩”。我说“辩”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但有些重要问题确实应该谈一下。

那“同”在哪儿？我先简单地说一下我们两个人的“同”。专业相同不用说了，重视从满族角度研究，是我们俩的“同”，包括用满文。更加重要的，我一直研究八旗，欧立德老师也是研究八旗制度，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分歧的。欧立德老师研究八旗制度，基本上强调的是八旗作为一个封闭的制度——这是我的理解——怎么塑造了满族族性，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清朝统治维持了将近三百年。而我研究八旗制度，则是延续大陆学术界传统，主要研究在八旗制度的阻隔下满族人和汉族人实际的交流是怎么发展的。换句话说，八旗制度的封闭性是怎么一步一步被破除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人是有不同，可是单凭这一点不足以引起我们两人拍桌子。为什么？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是从不同角度考察同一个对象，实际是一种互补关系。当然差异也有，我觉得在互补基础上，还是应从长时段地考察这个问题，八旗制度的封闭性被逐步破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说到满族是否“汉化”，过去习惯用“汉化”这个词，后来觉得这个词带有某种强制性单向灌输的意思，现在大家都排斥这个词，改称“涵化”。涵化有文化相互融通的含义，这一点已经进步了。可是长时段地看，满族人确实是接受了汉文化，或者准确地说，不是汉文化，而是中原文化。事实上不单满族是这样，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少数民族，如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包括后来进入中原的那部分蒙古族，无一例外都接受了中原文化。过去我们去田野调查，无论在云南、福建，还是四川，我跟定宜庄老师去那儿作田野调查，有居民说他祖先是蒙古人，还有居民说他祖上是女真人。比方说福建泉州粘氏，女真金兀术后人，其宗族现在分布在海峡两岸。他们早已归入汉族。当我们说到“汉化”问题时，我觉得这个词语本身就存在问题。什么问题呢？汉代的汉人跟我们说的清代的汉人、现代的汉人，是不一样的，区别很大。大家知道，汉代的人并不自称汉人，而称秦人，秦人已经是多民族融合，后来始有汉人之称。先秦时中原有五族，北戎、西狄、南蛮、东夷，中间是华夏。戎狄蛮夷哪儿去了？北朝一百九十三胡姓哪儿去了？到五代十国，五胡乱华，五胡哪儿去了？包括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都哪儿去了？绝大部分都融入汉人，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你说汉人的时候，我首先问你的是什么时候的汉人。汉人本身就是许多民族成分不断融合“滚雪球”般壮大的群体，我曾经用一个比较粗俗的词形容，即汉人是最大的“杂种”。这当然没有贬义，而是就族缘、文化的多元性来说的。所以当我们用满族“汉化”来表述，是有问题的，我觉得用“中原化”更准确、更科学。因此，当我们谈论“汉化”话题时，我更愿意从后来意义上的多民族混合的前提下来谈汉人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

至于中华民族，我知道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一种认为中华民族是虚构的，甚至说中华民族的建构到现在也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可是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上述观点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中华民族称谓，是清末出现的。当初提出这一观点最积极的，是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梁启超。可惜在政治上他们被孙中山的革命党斗败了。而孙中山的民族理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实际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在民族理论上最极端最狭隘的一翼。中华民族的理论为什么在清末提出来？我认为背景有几点。

首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清乾隆一朝，在中国历史上缔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一统国



家，嘉庆朝编纂《大清一统志》，把广大边疆地区全部纳入清朝疆域，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其次是近代以来西方民族理论的传入。随着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尤其甲午战争以后，大批学生到日本留学，开始在西方民族理论上重新思考国内民族问题，进而认识到在一个个单一民族之上，必须有一个涵盖清朝疆域内所有民族的专用词，即中华民族。

再有，谈到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不能脱离当时的国际背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相互作用，因为西方列强来了，然后到清末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侵略，到民国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正是在列强入侵的背景下，大大强化了中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这一点有大量史实为证，可是西方学者，恕我孤陋寡闻，很少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所以，在中华民族认同问题上，不是具体哪个民族的认同，而是涉及到中国各个民族。我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包括满族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清末有一个有名的满洲贵族，叫盛昱，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句。“白种贱”带有贬义，指西方殖民主义者。他称自己是“黄帝胄”，当然不能作窄义理解，说他自认是汉人，而是广义的，意指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我们应该不分民族联合起来，共御外侮。许多满族政治家、文学家有过类似表述。当然咱们现在不是举例的时候。我先说到这儿。希望欧立德老师能提出不同意见，然后我们继续进行。

欧立德：谢谢。我想，我们对中华民族的看法的确不一样。但不一样在哪儿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西方对于中华民族促成的理解，主流是说它失败了。但我会说，我不觉得主流的解释是说中华民族失败了。

刘小萌：我说是一种观点。

欧立德：好，是一种观点。这个我也写过，我宁愿说它还没有成功。我觉得这是民国初期的一种理想，人民知道世界上有民族国家这么一个新**政体**，我们必须适应。怎么适应呢？为了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我们要创造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个中华民族应该是怎样的？谁来参加呢？这个问题，当时有各种争论，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有争论，大家想法都不一样，对吗？

刘小萌：嗯，对。

欧立德：甚至于我在演讲的时候，我会问学生，尤其是中国的学生，有没有人以“我是中华民族的”来说自己？有人说“我是汉族”、“我是维族”，或者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是台湾人”等等，但很少听人说“我是中华民族的”。我不是说没有人，我知道有时候有人在某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会强调说“我是中华民族”，但一般来说，这不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想法，并以此来设想自己在社会里面或者说在世界里面的地位。当然，人们也许有一天会这么想，但是我们如果看今天中国的周边，我们很快也很容易发现，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不是到处都被认同的。

刚才梁其姿教授提到汉化问题，我想我们在这方面也应该讨论一下。毕竟这个问题是当初大陆学者之所以对新清史感兴趣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何罗之辩”这么一个辩论触发。其实我觉得何炳棣教授与罗友枝教授各有道理，问题在于他们对“汉化”这个词的不同理解。

我想何教授的意思是说，满洲人在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受汉人、汉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很深，如果说满洲人没有汉化是个很荒唐的理论。就这方面来说，我是同意何教授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满洲人没有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的确是很荒唐的，因为证据太明显了。事实上他们自己都承认。我们只要看档案，十八世纪的时候，皇帝、官员乃至周围的旗人、满洲人，说的都已经是汉语而不是满洲话了。如果汉化是指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那问题就该解决了。那么我也汉化了，因为我也受中原影响很深。如果我们说“汉化”是把所有汉人和非汉人之间的区别完全消灭掉，把非汉人改造成汉人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我虽然在第一个定义下“汉化”了，但是在第二个定义下，我当然没有“汉化”到那个程度——在那个意义下没有汉化，也永远不会汉化。

这就是罗友枝教授的意思，也就是说满洲人虽然在很多地方上，例如政治、宗教、艺术等等，

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最终毕竟还保留了与汉人不同的认同，没有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汉人。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呢？我们用满文的数据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我们只用汉人解释满洲人的情况的数据来考虑问题的话，那我们的考察只能是片面的；同样，只用满文的史料也有不足，那也是片面的。这不是说满文的史料是真实，汉语的史料是假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论满文抑或汉语，都是史料，但都有问题，这个必须由我们的老师们教我们的方法去作评价、分析。但是我们用满文的史料，就比较容易能够看到满洲人自己怎么理解自己的历史地位、在社会里面站的什么地方。看了这个之后，很明显地，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汉人。我想，何炳棣教授其实会接受这一点的，可惜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对话机会展开讨论……这就提醒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必须先弄清楚我们的语言、用词和词语。连“大清国”“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术语。刚才徐国琦教授问大清国是中国还是怎么样呢，我会说大清国是中国的一个表示，一个展现。但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得问自己，我们说的“大清国”和“中国”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是什么时候、哪个朝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大清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大清国、怎么理解中国会变得如此重要。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时必须很谨慎，而我觉得历来我们还不够谨慎，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知道这样讨论，有没有达到梁其姿教授所说的打架的效果？

项飙：双方似乎还在热身。但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再有一轮的问题。

欧立德：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让刘老师回答汉化的问题……

刘小萌：这个问题涉及头绪太多，我就简单地响应一下。首先，你说中华民族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但我宁愿说它是在形成过程中。当然如果你的意思是说还没有完全成功，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赞成。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华人学者叫唐德刚，他在谈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时说过，从近代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观点我赞成。同样，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没有完成，那我想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没有完成。这是第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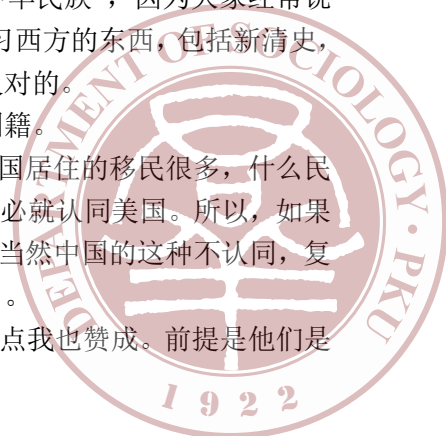
第二点，我刚才也强调说，中华民族不是虚构的，而是历史中形成过来的一个庞大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它的形成是成功的。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在中国 56 个民族中，汉族人占绝对主体，刚才我已经说过，它本身就是由不同民族成分汇合成的。汉人分布地区大概占到中国一半，可是从人口讲，占有绝对优势。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色，大概跟俄罗斯等多民族国家还是有些差别。这种凝聚力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大家也知道，中国每到春节，所有人都要回家，包括香港同学也回家探望父母、亲友。前段时间我看《参考消息》引国外一段评论，感慨说有几亿中国人集中在这个时间回乡探亲，说这种现象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凝聚，只要这种现象存在，中国就不可能分裂。这种现象当然别的国家也有。可是在如此强烈的乡土意识、亲情意识驱动下，途中克服那么多的困难，饱尝那么多的艰辛，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的人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追求。这种追求，这种凝聚力，在谈到中华民族话题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至于说中国国境内有一部分人不认同中华民族，或者不使用“中华民族”，因为大家经常说的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我跟学生经常讲，你们要尽量学习西方的东西，包括新清史，可是你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治学，不要什么都拿过来照抄，这我是反对的。

欧立德：但我会说，你要从学者的角度来想。我不是这么重视国籍。

刘小萌：对，国际化的视野，这并不矛盾。谈到认同，我想在美国居住的移民很多，什么民族的都有，他们是不是都认同美国？我想好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也未必就认同美国。所以，如果说中国有一部分人不认同中国，不认同中华民族，我觉得也很正常。当然中国的这种不认同，复杂性要超过美国，这点我承认。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在现有情况下，我们应更多考虑中国非汉民族的利益和呼声，这点我也赞成。前提是他们是



中国人，即便他们中的一部分不这样认为，具体地说如新疆的维吾尔族，可能他们当中不认同的人比较多，或者蒙古族人也有一些，我接触过一些，他们就不认同。可是别忘了，新疆仅伊犁地区就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我的锡伯族学生，他们都有很强烈的中国认同，他们不希望新疆被伊斯兰化，他们同样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民主的生存空间。所以我想应该这么认识这个问题。当然我在海外比如在法国也接触过维族学生，包括民族大学毕业的，他们知道我在民族大学学习过，很友好。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些人不认同中国或中华民族。可是这种不认同是天然生成的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影响的呢？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研究问题上，他们要是按照认同的观点来写论文的话，我估计在申请资助或者一些问题上，也可能会有难度。这是我从一个中国学者角度来考虑问题。

四、地域、民族与政治

项飙：要不先再搜集一轮问题，好吗？

提问者甲：我的问题是，我看到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有一位学者叫做钟焄，他指出了柯娇燕教授（Pamela Kyle Crossley）的一些书的错误，并且认为柯娇燕教授是出于美国学者的视角和观点。然后柯娇燕教授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回复钟焄的文章。我读了这些文章之后，感兴趣的一点是，请问您觉得在研究历史、研究这样一个话题的情况下，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如何能避免自己个人的偏见？尤其是中国的学者，自己作为中国人，如何能跳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观念、思维方式，来客观地看待民族问题？比如说有很多中国人会有一种汉族至上的汉族沙文主义或是大中华主义。这是我感兴趣的一点。还有像欧立德教授刚刚提到“帝国”（empire）这个概念，好像中西方学者对这整个概念有不同理解，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一种共通的基础（common ground）？然后在这个共通的基础上，中西方学者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沟通和交流？

提问者乙：欧立德教授大概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在注脚里面提到“是中华民族”这种说法，我读到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我自己是研究苏菲的，其实是研究回族的，我听到过很多人会讲“我属中华民族”，然后说“我是什么什么族的”。我当时就有一点奇怪。我觉得英文里面 identity 和 belonging 这两个词分得更清，在这两个概念，虽然会有交叉重合，但不一定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他在讲到中华民族的时候说是“我属”（belong），然后在讲别的东西的时候会说“我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自己在调查当中发现的。

第二个问题，其实刚才刘教授讲到“中原”，这个概念在我自己的研究里面非常重要，因为回族对自己族源的讲述就跟中华民族的讲述是一样的。他讲，我们就是由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等各种不同的民族与汉人之间结合的结果。所以他的族源本身不是一个核心，而是所有的聚到一起。但这样一种讲述，它的核心其实是土地，这种结合是在这块地方发生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而刘老师刚才讲的“中原”的概念也是一个地域（territory）的概念，而这样一种关于地域的争论，其实是九十年代何炳棣先生写的清代的 legacy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疆域。当然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两位老师，在您两位对于满族的研究当中，对于这种 legacy 或者对于族群的研究当中，territory 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它重不重要？或者说是在两位的 framework 里面有什么样的作用？

项飙：好，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最后一个机会。好，没有，那就最后一轮对弈。

刘小萌：还没打起来呢。欧教授你先讲。

欧立德：我先讲。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其实我们可以谈很久，谈不完。

钟焄和柯娇燕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很正常。这个不见得只有因为某人是中国人、某人是美国人，所以才有这么一个争论。这个我觉得说不通。要在大陆学者当中找一个想法和柯娇燕教授类

似的，或者觉得柯教授写的东西基本上都赞成的，也不难。我不认识钟焯，没跟他接触过，他看柯教授的书、文章的时候，不满意，不同意，觉得有问题，觉得他有责任要发言，这是在学术界里面的正常行为。我会觉得，有时候他说得是不是有一点儿太极端了，是不是有一点儿过于吹毛求疵，那种说法，不愿意承认柯教授里面的任何东西有任何一点价值。这可能值得商榷。同样，柯教授呢，人家在攻击你的时候，很容易想，我要回答，他不理解我要说的意思。到最后，我想是年轻一代的学生们自己要决定这个辩论的价值在哪儿。当你看他们两位在争什么问题的时候，对你自己有什么启发，让你想什么，让你更想知道什么，从而让你想找一个更好的回答。我这么想，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算是成功的争论。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关于“属中华民族”和“我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以后我会以这个为参考，会去想。确实因为语言，中文语言的用法和英文当然不一样，套用一种语言来想第二种语言当然是很大的一种错误。我想在我们的工作中，天天在做翻译，我们看中文的或者是外文的，把它翻成自己母语的时候，我们天天在做这种翻译，而做这种翻译的时候也会犯错误的。所以只好更加谨慎。

最后的问题是关于地域和族群的，其实这个问题要展开的话也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我当然觉得地域很重要，我们只要看清代出的地图，就知道上层、中层的人，政府里面的、政府外面的有识之士，对于地域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在科技上，在思想上，对于地域的想法也有各种方面的变化。下个礼拜在科技大学图书馆里面有个展览，科技大学有很好的地图收藏，这些地图对于了解清代对于地域的理解很重要。可惜的是，最宝贵的地图收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而第一历史档案馆至少 25 年以来不让学者们看他们收藏的地图。据我所知，这个不是针对外国学者，也包括国内的学者。这个刘老师当然比我熟悉，很难很难看到，大概有上万的各种地图。除非我们有那种史料，这个问题恐怕不太好回答。我知道李中清有一次看到一些……

李中清：……才几千。三千，三四千完整的……

欧立德：才三千。再加上那小的地图的话……一共多少？谁知道。

刘小萌：台湾有一大部分，1949 年被国民党带走了。

欧立德：对，台湾也有。

刘小萌：时间也不多了，那我也简单地谈一下吧。我觉得现在在跟新清史的对话中的一个趋向，好像是批判性越来越强。可是为什么在对新清史的批评或者讨论过程中，我过去不太愿意介入？一个，说私人关系吧，我们是师兄弟。另外我的师姐定宜庄教授一再提醒我，欧立德可是你师弟啊。我跟定教授在新清史问题上也有些分歧，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人想邀我们对辩，可是我更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次对话是个例外。你们很少见我发表意见，其实我是有想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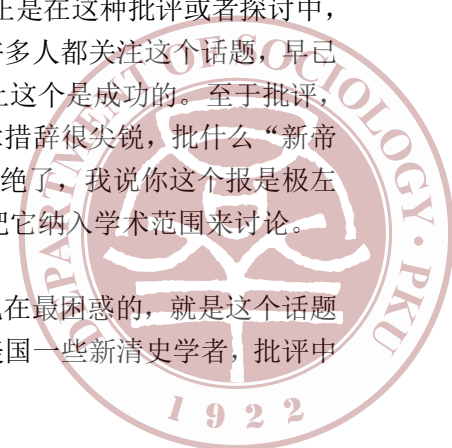
欧立德：你说是想法，我会说是你的意见，对吧？都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

刘小萌：对。因为大家走到这一步，做共同的研究，无论是海外的学者、国内的学者，除了学术交流，大家都很珍视的还有一份友谊。虽然我们有分歧，可是我们要珍视这份友谊。

至于批评，我觉得正常的批评、探讨，本身就是推进研究，而且正是在这种批评或者探讨中，新清史的影响其实并没有缩小，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还扩大了。现在许多人都关注这个话题，早已不限于满族史这个小圈子，包括相关的学术领域，我会说某种意义上这个是成功的。至于批评，我们现在最反对的是用文革方式、语言来扣帽子。在大陆，有些文章措辞很尖锐，批什么“新帝国主义”。有家报纸知道我对新清史有批评，向我约稿，我当即就拒绝了，我说你这个报是极左平台，我不会在你这儿发表一个字。关于与新清史的分歧，我愿意把它纳入学术范围来讨论。

欧立德：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学术对话太政治化。

刘小萌：摆脱政治化，是我们对话一定要遵守的原则。可是我现在最困惑的，就是这个话题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又带有政治性。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一些新清史学者，批评中



国的清史研究，总认为你们是民族主义思想，甚至说你们代表官方意识形态。最近台湾的徐泓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批评新清史的文章，特别举出美国学者的研究带有政治性的例子。后来我就反思，美国新清史研究有没有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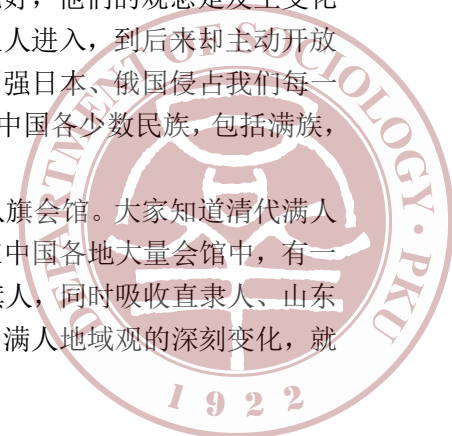
欧立德：当然有政治，做学问都有政治。

刘小萌：对。美国学者一直说自己是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我们也承认，起码在座的欧立德教授或者其他教授是真正的学者。可是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谈到中国的边疆问题，谈到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对中国人来讲，这本身就意味着有很大的政治性。尤其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他们谈到中国的民族关系，所有的关注点，不是民族的融合，而是民族的对立，包括满汉关系。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我也希望在这个场合提出来，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把对话限定在学术范畴，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由于双方文化背景、政治理念的差异，不能不承认观点背后的政治性。换句话说，对中国学者，你们可以说我们有政治性，而我们现在也普遍认为美国的学术背后同样有政治性。如何对待学术背后的政治性，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

美国学者说，研究中国应摒弃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也就是要从中国角度进行研究，进而提出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现在不少中国的学生也这么说，说我从满族角度如何如何研究。前两天我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答辩，答辩者说他是从英国视角研究晚清西南地区的法英中关系。后来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你用的资料主要是英国档案，这是否就意味着你是英国视角呢？”换句话说，当美国学者说他们用中国的视角或满族视角研究中国时，他们有没有主观性？作为西方学者，他们的文化素养、西方的这套文化系统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当然我自己也是一样，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专业研究领域，不赞同美国新清史的某些观点，是很正常的。说得简单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差异使然。我在 2010 年《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那篇文章中说过，有些观点歧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歧异，即使通过讨论恐怕也难以陶融。中美学者，各有自己的国情，存在着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研究角度、理论方法的诸多差异。新清史无论怎么强劲，毕竟是在异文化的视野中观察中国，而运用西方理论和话语系统诠释中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实情的问题。大陆的一些年轻人，盲目接受西方和美国新清史观点，然后就拿来生搬硬套。这个现象可能也是招致大陆学界对美国新清史持批评态度比较大的一个原因。中国是一个大国，过去总讲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即便将来有一天完全走向现代国家了，完成现代化了，那它的中国史研究，这么一项非常本土化的学科，还是会有自己的独立立场、角度和话语，不可能因为走向全球化，我们就完全使用西方的话语、西方人的思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

另外，我再简单说几句，关于地域观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地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刚才有学者问到它与满族认同的关系，我就想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在光绪年间，1884 年，1907 年，清政府把东北地区和新疆从将军制改为与内地划一的省制或者说府县制？清政府用政治制度一体化，来应对国外列强，尤其是沙俄、日本，对东北、西北边境造成的巨大危机。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满族人也好，东北的满族人也好，他们的观念是发生变化的。东北是满族故乡，满洲统治者在东北长期实行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进入，到后来却主动开放东北，欢迎汉人到来，动员组织汉人开发、建设边疆，以阻止外国列强日本、俄国侵占我们每一寸土地。这反映了满族地域观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实际也反映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包括满族，对国家的认同、彼此间认同的变化。

最后还想举一个满族地域观变化的具体例子，最近我正在研究八旗会馆。大家知道清代满人以八旗制度为本族组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然而到了近代，在中国各地大量会馆中，有一类非常特殊的会馆，就是八旗会馆。各地八旗会馆的成员不是只有旗人，同时吸收直隶人、山东人、奉天人，这四类人以旗人为核心，共组为一个会馆。这就反映了满人地域观的深刻变化，就



是“我们是同乡”。这种认识已完全超越狭隘的“旗人”意识、满人意识。

项飙：欧老师，请非常简短……

欧立德：很简单，两点。一个是对于在以中国为中心（China-centered）的研究方法，跟以满洲、大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怎么做评价。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要取得一个平衡。你说对了，国内学者在谈满汉关系的时候，强调的是满汉之间的关系多么地平衡，多么地友好。西方强调的是满汉之间的对立。事实上，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满汉关系，这不是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一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满文档案里面，确实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满汉之间的紧张，有时候会爆发。我们即便是强调这个对立的时候，也不是说他们天天在市场里面吵架、打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群体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紧张，是这一点。而这一点你不了解，你就不可能了解朝廷，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朝廷里面的人际关系是怎么回事。我想这一点刘教授你或许会同意。

刘小萌：嗯。

欧立德：我知道，他们批评新清史的时候把这个对立看作是非常悲观的、负面的。我想我们不要只看负面的，同样也不要只看正面的，这两方面都要承认。最后想说，到底有没有纯粹的学术。我们得承认，我们都躲在自己那个小洞里面做学问，像青蛙，坐井观天，很难窥全豹，但我们尽力而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受到限制。说背后有政治左右，那倒是。但我还是要说明白一点，在美国政治背后的作用，跟在大陆国内政治背后的作用完全不一样，不是一回事。美国要出书的时候，不经过什么审查，没有人在看，没有人在说“这个字你不可以用，那个字不可以用”，没有人管，你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我要说的是，你们做学问、发言所受的限制，要比在美国多得多。这个我想我们不要因为是政治背后的作用，觉得美国学者跟中国学者处于同样的格局里面。不一样的……

刘小萌：我不反对。可是呢，分歧……

欧立德：在中国做学问不容易。

刘小萌：不容易……

项飙：我很遗憾不得不结束这一场的对话。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刘老师提到的网络上的预测，这个辩论可能是一个世纪之辩，所以那么精彩。像刘老师提到，正是因为这个辩论当中有很多挑战和困难，也因为这些困难，刺激我们更好地思考，逼着我们走出自己原来那个舒服圈（comfort zone），去面对原来不想面对或者原来没有想到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对话是你们过去 25 年之间交流的总结。

刘小萌：是个开端。

项飙：对我们和在座的各位同学是一个开端。所以我们的任务可能是把这个对话继续下去，不要因为它的艰难而回避。而正是因为它的艰难，我们要把它保护下去、持续下去。当然要思考怎么样使这个对话更加有效，就是像欧老师讲的那样，（怎么样在对话中）从对方那里学到东西，共同促进我们的研究。好，谢谢各位。

